

孔祥毅文集

(六)

金融史
I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孔祥毅文集

(六)

金融史
I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孔祥毅文集/孔祥毅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 - 7 - 5096 - 4344 - 0

I. ①孔… II. ①孔… III. ①金融学—文集 IV. ①F83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4940 号

组稿编辑: 杜 菲
责任编辑: 杜 菲
责任印制: 司东翔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16
印 张: 233.75 (全九卷)
字 数: 3916 千字 (全九卷)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96 - 4344 - 0
定 价: 128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本书承瀚华金控股份有限公司资助出版

本集目录

农业经济时代的金融

古晋阳的商业与货币.....	3
明以前中国农业社会的商业文明与金融活动	15

票号的兴衰

山西票号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性质	35
山西票号与清朝官吏的关系	42
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	47
山西票号壬子九十年祭	64
日升昌票号的兴衰	72
从山西票号的兴衰看金融协调	75

票号的经营管理

山西票号的利润导向	87
-----------------	----

山西票号高效执行力的动力机制	97
山西票号的风险控制及其现实意义	105
票号商人的商业伦理及其现代意义	118
票号的组织制度与经营管理	127
晋商金融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研究	138
《协和信账簿》评价	157
明清山西货币商人对中国会计制度的创新	164

票号与金融危机

清末金融风潮	181
1893 年金融危机中的票号与钱庄	186

山西货币商人的金融创新

山西货币经营资本研究	207
把钱币研究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	218
中国特色的股份制：人力股 + 资本股	224
明清时期山西货币商人的金融创新	230
中国早期人力资本股的实践对当代企业改革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37
山西货币商人的标期和标利	245
历史上山西金融的对外开放	250
镖局、标期、标利与中国北方社会信用	259
金融机制创新的历史变迁	2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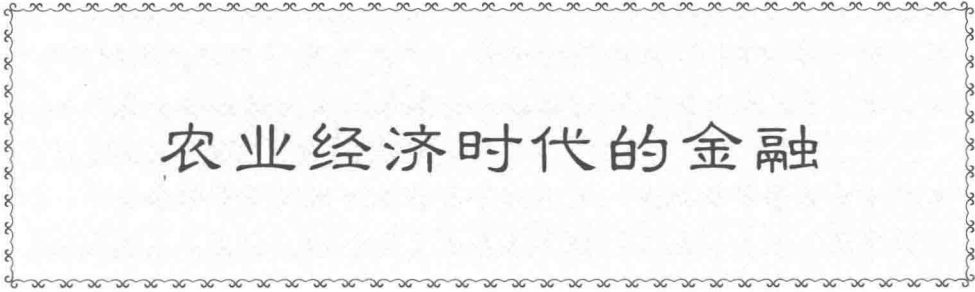
再谈明清山西货币商人的金融创新·····	295
“人身股”能够为企业改革注入活力·····	307
山西商人与中国金融革命·····	316
货通天下 汇通天下·····	337

近代银币与银行

鸦片战争后的货币制度与货币流通·····	349
外国银元流通和中国自铸银元·····	364
历史上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及其活动·····	369
中国现代银行业的产生·····	388
清末北京城行用竹牌货币·····	399
透过货币制度求解“李约瑟之谜”·····	401
《中国对外金融关系演进分析》序·····	403
《国际金融中心历史变迁与功能演进研究》序·····	406
《票号与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比较研究》序·····	410

专 访

孔祥毅纵论山西金融发展史·····	417
解读晋商·····	420
华尔街得向山西大掌柜学什么?·····	448



农业经济时代的金融

古晋阳的商业与货币

背景说明

本文是2008年应太原市晋阳文化研究会之约而写，原载《晋阳文化研究》第二辑下，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后被收录《建设特色文化名城——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古晋阳是中国商业活动最早的地区、先秦金属铸币出土最多的地区；从汉晋到隋唐古晋阳商业表现出北拓与西进、与少数民族和国外不断进行商品交换的开放性特点；适应商品交易的发展需要，信用与信用机构及其相应的信用工具也出现了；舜帝是华夏第一商，古晋阳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金属铸币的地区，侯马东周造币遗址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造币工厂，隋唐时期晋阳开始使用类似支票等信用工具。

公元前21世纪以前，山西一带是部落首领尧的领地，其活动的中心在晋阳、平阳地区。晋阳，初为陶唐之地，东汉郑玄《毛诗谱·唐谱》说：“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日太原晋阳是也。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司马迁《史记·晋世家》说：“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①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说：“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尧山是也……尧之都后徙晋阳，今太原县是也……及为天子，都平阳。”又说：

^① 《史记》。

“禹自安邑都晋阳，至桀徙都安邑。”西周初年，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因为南有晋水，叔虞子燹父改国号为晋，这是在公元前1018年的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说：“唐叔之子燹父改唐为晋，即今之太原市。四世至成侯，南徙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又五世至穆侯，复迁于降，降即翼。”故唐城究竟在何地，说法不一，一说在翼城县西20里；一说在并州晋阳县北2里。不论故唐城在哪里，故唐城与古晋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本文所说的古晋阳的商业与货币，实际是研究今太原及太原周边地区从先秦到汉唐的商业与货币。

一、华夏商祖出陶唐

现代商业行为，一般与市关系密切，城市是商业活动的中心。但是，在城市产生之前，商品交易与市的活动已经开始了。据《易·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①这是中国最早的商业活动。《易·系辞下》接着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改进运输工具，连通水陆交通，“引重致远”，进行商品交换。据《淮南子·齐俗训》记载：“尧之治天下也……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枚，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用以其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其所无，以所工易其所拙。”^②这分明是说尧实行社会分工，生产品通过交换，互通有无。可以说，尧帝是中国最早的商品交换的组织者。“相传尧时都邑内有三个市，而尧毫不为市上五光十色的商品所诱，仍然穿粗布衣，吃糙米饭，过着简朴的生活。”^③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④就是说舜做过农夫、渔夫、手工业者和小贩等。《史记索引》解释“就时于负夏”时说：“就时犹逐时”，孟子曰：“迁于负夏是也”。《绎史》卷十引《尸子》：“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卖贱，于是债于传虚，以均救之。”^⑤在贱的地方买，

① 陈鼓应等：《周易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② 《淮南子·齐俗训》。

③ 《中华古文明大图集·通市》。

④ 《史记·五帝本纪》见《史记》三卷本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⑤ 田兆元等：《商贾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到贵的地方卖，这是典型的商业活动。可以说，舜帝就是中国第一商人，称得上华夏商祖。“舜巡视天下，不幸死于道途，即‘葬南己之市’。”^①

尧舜是新石器时代的人物，已经有了商品交换的集市。传说禹的父亲鲧，也是一位部落首领，“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开始修筑城郭。^②城市的发展是沿着集市—街市—城市逐步演进的，简单的、偶然的商品交换在交通方便的地方首先开始，时间长了、规模大了，就不再以日中为市，交易而退，而是就地盖房屋，形成街市；街市进一步发展，规模扩大，演变为城市。鲧所造的城郭也许已经包含了商品交换的街市。

夏代，在夏都以及各部落活动的中心，平阳、蒲坂、安邑、夏县、翼城、垣曲等地，市场交易最为活跃。相传，夏县是黄帝妻子嫫祖出生地，她发明了育桑养蚕、缫丝织帛，并染成各种颜色，用来缝制衣物。考古学家曾在夏县西引村发现蚕茧化石，证明蚕丝在山西已有 4000 多年历史。^③手工业的发展，必然促进商品交换发展。“据说夏朝的末代君主桀荒淫无道，竟然‘放虎于市，以观其惊’，拿百姓的性命当儿戏。难怪商汤兴师讨伐时，市上卖东西的人都抛弃自己的货物，纷纷出城投奔商汤。”^④可见夏朝的市，已经发展到相当的规模了。

二、最早的金属铸币

从禹到夏代，是不是商品交换已经由物物交换发展到通过货币的交换，现在没有考古的实物证明，《管子》说的“禹以历山之金铸币”，可能是一种推想。司马迁在《史记》说得比较客观：“农工商交易之路通，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⑤他没有说舜、禹到夏朝有固定的金属货币，而是说虞舜、夏到商朝，货币是由多种金、布、刀、龟贝等物品扮演的，“及至秦”货币才得到统一。那么夏、商、周之间将近 1800 余年，就是商品交换对交易媒介物单一化的选择与淘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晋阳地区仍然是走在最前面的。

①②④《中华古文明大图集·通市》。

③ 渠绍森：《山西与“丝绸之路”》，山西卫视农网，2006 年 8 月 10 日。

⑤ 《史记》三卷本中册，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

商代，晋阳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不少城市，特别是封国和方国的封地中心，“比如今长治市西南、榆社、介休西南、太原南部、平陆县北、石楼县，都为商人们开辟了市场。此外，部落酋长的驻地和商王朝在山西统辖范围以外的周边部族，也是商人的贸易之地。他们用珠玉、饰品、食盐、织物、牲畜、毛皮以及奴隶等进行交易；酒不仅是当时社会上层不可缺少的饮料，而且也是社会下层普遍需求的商品。当时有所谓‘屠畜易酒’之说，这大概指的是一般平民。”^① 因为晋阳地区始终是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叉地带，这对商品交换流通影响很大。由于专门从事产品交换的人不断增多，逐渐形成了商人阶层，商业开始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物的物品种类由宽泛变得简约，在晋阳及其周边地区有当地农具铲子，有打仗或者自卫用的刀，有纺轮，也有来自海边的装饰品海贝，海贝数量不能满足需要，就用兽骨、玉石磨制骨贝、石贝，青铜出现以后，就用青铜仿制海贝。1971年山西考古工作者在保德县林遮峪商代墓葬中发掘出铜贝109枚，海贝112枚。证明商代在晋阳地区已经开始使用了铜铸币。

周代的市场管理比较严格，按照《周礼·地官》的描述，“市有市门，门旁站立着执鞭的市胥。市内有市师（又称司市，掌管市政的官员）的办公室，称为思次，上面悬着旗帜，司市通过变换旗帜来发号施令。市内又有胥师、贾师的办公室，称介次。市内的大事和重大争讼，在思次决断；小事和争吵则在介次处理。思次设官吏多人，以司市为首长，其下有质人，负责开立买卖和借贷文书，有廛（chan）人负责征税，贾师负责掌握物价，司鹵（bao）、司稽负责维持秩序和治安，有肆长负责市内场地规划安排，泉府负责用征税的税款买进卖出，以调节物价，收取利润，并出贷取息，兼济官私，此外还有负责杂役的市胥多人。官吏都有各自的印章。日中大市，百姓聚集；早晨朝市，行商坐贾为主；傍晚夕市，贩夫贩妇为主。国家针对市制定有法禁，关于百姓、行商、坐贾、工匠的规定各十二条。”^② 这种描述可能有所夸大，因为周朝八百年，跨度大，也很难完全否定。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商品化程度提高，晋阳地区经济富庶，手工业发达，很多农产品与手工业制品进入市场，加上汾河与黄河水上交通，商业

① 黎风：《山西古代经济》，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② 《中华古文明大图集·通市》。

空前繁荣。晋文公（公元前 697 ~ 前 628 年）登基时，把百工和商贾纳入政府管理之列，使之成为官工和官商，即所谓“工商食官”，制定了“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政策^①，即减轻商税，除盗安民，商旅沿途往来安全。随着领主封建制向地主封建制过渡，“工商食官”制度逐渐废弃，自由商人大批出现。《史记·赵世家》记载：上党“有城市邑十七”。在这些城邑里，一般“列市成行，店铺林立”，牲畜也在交易之列。^②在晋阳以北以西地区，农牧相杂或以牧为主，以游牧狩猎为业的戎狄民族，不仅用牲畜和畜产品与商人进行贸易，而且“贵货易土”，连他们赖以发展畜牧业的草地和宅圃，有时也用来同商人交易，换取其所需物资。所以商人们在那里也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山西自古有“盐铁之饶”，凡经营盐铁的商人，都很快发迹。《国语·晋语》中提到这些暴发为巨富商人时曾这样记载：“夫晋之富商”，“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③司马迁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今洪洞）、平阳（今临汾）陈西贾秦、翟（指陕西和西北戎狄民族），北贾种、代（山西阳高和河北蔚县一带）。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羨。其民羯羗不均，自全晋之时……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温县）、轵（济源）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④可见晋阳地区确实已经成为中原商业枢纽。随着商品交换的频繁和规模的扩大，以生产工具和其他实物作为媒介物越来越不方便，不易分割，不易携带，体积大，价值低，而铜的出现与运用，使商品交换的媒介物逐渐被青铜替代。前述 1971 年保德林遮峪商代（公元前 1600 ~ 前 1100 年）墓葬铜贝出土，堪称中国铜铸币之滥觞，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铸币，比公元前 600 多年地中海地区一些国家铸币早 500 ~ 1000 年（公元前 700 ~ 前 600 年小亚细亚和希腊铸造金银币，是西方铸币之始）。

春秋时期（公元前 770 ~ 前 476 年），古晋国大量铸造金属货币，山

① 《国语·晋语四》。

② 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第一辑，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3 年版。

③ 黎风：《山西古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7 年版。

④ 《史记》三卷本下册，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

西考古专家朱华在他的《三晋货币》一书中说：“在侯马东周晋国遗址内出土空首布的地方还清理出一处铸造青铜器的作坊遗址，于大量铸造青铜器的陶范中还同时出土相当数量的空首布陶范和布首釜（qiong）内的范芯，空首布陶范中以范芯尤多，如一个4米×4米的发掘方中范芯的堆积厚达60厘米，据多年来积累所得范芯估计约有数十万件。有的布范内还留有尚未取出的空首布。这些现象足以说明当时铸造空首布的规模与数量是相当庞大的”。^①这显然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造币厂，公元前5~8世纪的古晋国造币厂比欧洲出土的公元后3世纪罗马铸币工场早700~1000年。

贝币从殷商至春秋初行用较多，并经历了从真贝到铜贝的演变过程。铜贝行用约三四百年，东周初逐渐退出流通。侯马晋国遗址曾一次出土铜贝1600多枚，属东周初期货币。在古晋国出土春秋战国空首布的地点有太原、榆次、寿阳、侯马牛村、运城李店铺、稷山吴城等地；出土平首布的地点有太原瓜地沟、太原金胜、祁县下王、交城、汾阳、高平箭头、阳高天桥、原平武彦、陵川、天镇、孟县洪塘、孟县东固、孟县南村、夏县司马、洪洞师土、朔县沙楞、襄汾小赵、运城西袁庄、屯留、代县沱阳、浮山大邢、山阴、翼城上吴、侯马、朔县北旺庄、黎城、繁峙牛村、夏县、怀仁、平陆、大寨、忻州、朔县秋寺院、定襄南关、右玉梁家油坊、左云、灵丘、五台、忻县、万荣西解、永济薛家岩、芮城城南等地；出土刀币的有交城、山阴故驿、永济薛家岩、高平箭头、原平武彦、朔县沙楞、孟县南村、浑源、神池、怀仁、右玉梁家油坊、左云等地；出土圆钱的地点有闻喜苍底、侯马东门外、侯马、翼城上吴等。

晋阳地区出土布币的文字大体上有：晋阳（太原晋源）、甘丹（邯郸西南）、榆即（榆次境内）、兹氏（汾阳境内）、蔺（离石西）、离石（离石西）、平盩（文水平陶）、文阳（文水境内）、肤虑（五台古城）、中阳（中阳境内）、西都（孝义境内）、平州（介休境内）、寿阴（寿阳境内）、北兹（汾阳北）、新城（朔县南）、藿人（繁峙境内）、阳曲（阳曲境内）、辛城（朔县南）、处奴（太原郊区）、隰城（隰县）、土匀（石楼）、阳邑（太谷阳邑）、祁（祁县古县）、中都（平遥中都）、邬（介休邬城）、乌疋（介休邬城）、鄆氏（沁水端氏）、平阳（临汾西南）、长子（长子西）、露（潞城东北）、屯留（屯留县南）、涅（武乡故城）、同是

^① 朱华：《三晋货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沁县西南)、高都(晋城高都)、襄垣(襄垣县北)、蒲子(蒲县略东村)、奇氏(临猗境内)、北曲(吉县北)、皮氏(河津太阳)、虞阳(平陆县北)、霍(霍县北)、安邑(夏县禹王城)、蒲反(永济蒲州城)、垣(垣曲县北)等。属于三晋货币的还有很多在当时赵、魏、韩的货币在今河北、内蒙古、河南、陕西铸造地有20处,还有现在尚未能辨认的货币铸造地约32处。^①最精美的布币是晋阳布。公元前497~前247年,晋国公卿大夫赵简子执政时,铸有耸肩大尖足布、小布和类圆足布,币文“晋易”即晋阳,此币在山西原平、阳高县等均有出土,形如铲,是接近器物原状的早期货币,耸肩尖足小布铸有“晋易半”三字,是大尖布的一半,这是中国最早的主币与辅币之分。

三、中原商业的北拓

秦国时期,建立了太原郡,郡治设在晋阳,秦统一了币制,“半两”钱在山西河津县、安泽县、榆次市均有出土。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为了防御匈奴南下,高祖刘邦改太原郡为韩国,都城设在晋阳,封韩信为行王,坐镇北方。公元前196年,又把雁北和太原郡划在一起,称为代国,封他的儿子刘恒为代王。晋阳又成为代国的都城。公元前180年(汉高后八年)吕后去世,周勃等人拥戴刘恒继位,史称汉文帝。刘恒苦心经营的晋阳,不仅是军事重镇,也是北方的商业中心,农业也很发达,手工业水平很高,能造耀眼夺目的钢镜、铁镜等商品。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太原郡“户十六万九千八百六十三,口六十八万四千八十八,县二十一”。当时,在今天的山西境内有252万余人,可见其中有近30%的人口生活在太原地区。从晋阳城创建,经秦到两汉时代,这个时期是古晋阳的又一个兴旺时期。虽然汉民族与匈奴时有战争发生,但因为地理关系,晋人出塞与匈奴进行贸易很频繁,多在边关进行,称为“关市”。《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记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使马邑人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②聂翁壹“以财雄边”,他除经营大牧群外,还和匈奴进行走私贸易,聂翁壹的后代张辽,也与匈奴勾结进行走私贸易,谋取厚利。张辽曾经通过边地贸易,为曹魏筹集军饷。除了“关市”以外,还

① 朱华:《三晋货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二十五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

有一种市易叫“军市”，即沿边驻军和军屯之地，都有小型市集。“汉发三将军屯北地，代屯勾注。”^① 勾注即雁门山，就设有军市，通过商人贩运货物，补充军用物资。与北边游牧民族和边防驻军的贸易，始终是古晋阳商贸发展的一个特点。

西汉以来，潞、泽栽桑养蚕、缫丝织帛已很普遍，使山西得以用丝绸对外易货，除有少数山西商人经“丝绸之路”西去做丝绸买卖外，多半是西域商人来山西交易，间或有欧洲商人前来，各地多留有他们的足迹。《中国交通史料汇编》曾记有：“清末西人在山西霍州灵石县地方掘得罗马古铜钱十六枚。现钱面镌文，盖悉为罗马皇帝梯拜流斯至安教皇帝时代所铸者也”，梯拜流斯为罗马第三代皇帝，时值我国西汉末、东汉初。当时，灵石为山西古代三大都会之一，是来往于晋阳，洛阳、长安之间的要冲。灵石出土外币说明那时外商是假丝绸之路之便而来到山西的。与此同时，北越长城，途经蒙古，到西伯利亚转欧洲的商路，成了当时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的分支。这从西伯利亚和山西境内发掘的青铜器以及太原通往蒙、俄边境和林的路上挖掘出土的汉代漆器都可以得到证明（参见渠绍森：《山西与“丝绸之路”》山西卫视农网，2006年8月10日）。两汉时期，晋阳地区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除了盐铁及其他日用品外，粮食也经汾河、黄河漕运长安。《汉书》卷七十六载：“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入市斗变，吏不能禁。及翁归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馈，百贾畏之。”^② 可以看出，两汉时期城市商业管理已经显得十分重要。

西晋（公元265～316年）以后，到北魏统一北方以前，战乱不停，冲击农耕，商业凋敝。北魏建都平城（今大同，公元398年）以后，社会稳定，商品交换随着经济恢复与发展而趋于活跃，除与南朝通商外，还恢复陆上丝路贸易。随着佛教交流活动的发展而有了频繁的商业往来。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一书中提到，在今吐鲁番、西宁、太原等地，均先后发现过四世纪以来的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即为佐证。在北齐（公元550～577年），晋阳城是各地物资集散地，大量的畜产品、手工业产品在此交易，与国内以至西域诸国贸易往来，甚至城内出现了依靠租赁店铺而获取利润的人。当时，中亚、西亚人成群结队，络绎而来，在晋阳地区进行贸易。政府还设立专门供西方商人开展贸易的场所，便利来华外

① 吕思勉：《秦汉史》。

② 《二十五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